

提高劳动者地位的关键在于 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陈学明

讨论当今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如何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在我看来,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目前我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和谐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地位的低下,劳动者收入的偏低,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我认为,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关键。

事实上,现在有许多人都在关注并研讨这一问题。但非常可惜,我看到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往往热衷于在“管理学”的范围内研讨这一问题,似乎当今中国劳动者地位低下主要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机制不完善,而只要真正实施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劳动者目前的处境就能得以改善,于是他们就企业管理问题绞尽脑汁给政府,同时也给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出点子;同时我也看到,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许多人更醉心于在“伦理学”的范围内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把劳动者地位的低下归结于当今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为富不仁”上,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在富人“鼓鼓的”钱袋上,企图通过向这些富人宣传“仁爱”,让这些富人从“为富不仁”变为“为富讲仁”,心甘情愿从自己的钱袋中拿出一些“施舍”给穷人。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办法都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是属于爱毛反裘、不痛不痒之举,我们只能姑妄听之。

我认为,要真正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就不能回避生产关系。2010年6月3日的《社会科学报》发表了赵修义教授的一篇题为《不要再回避生产关系了》的文章,赵教授在文中强调在

研究当今中国的问题千万不能再“放弃生产关系的维度”,他还抱憾他在几年前就已撰文“提醒”“不要忘记生产关系的维度”,但“可惜应者寥寥”。在我看来,赵教授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研究当今中国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离开了对生产关系的考察,那就是背本趋末,冬扇夏炉。胡锦涛总书记“五一”前夕的讲话使用了这样的论断:“我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1]正如赵教授所指出的:“这就提示我们在考察分析的时候,不该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而放弃生产关系的维度。”^[2]

如果着眼于生产关系来思考提高劳动者的地位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研讨“中国经济转型”与劳动者地位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转型”作为一个不可讨论的前提来加以接受。不能把全盘接受“经济转型”作为讨论劳动者的地位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好像我们首先必须认可“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一切,只能在认可这一切的前提下来研讨提高劳动者的地位问题。这样我们就不会去思考“经济转型”与目前劳动者地位的低下究竟有没有联系,我们的思维被禁忌在思考这种关系之外。可事实上,倘若我们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研讨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就不能不去思考“经济转型”对劳动者地位的影响。

我理解我国的“经济转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从封闭型转化为开放型;从单一公有制转化为多种形式所有制。这三个方面的转型当然隐含着生产关系的某些改变。必须承认,我国的“经济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转型”从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使我国在30年的时间里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不能否认,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与“经济转型”同步的。但同样必须认识到,“经济转型”在充分展现其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尽管后者与前者相比是非主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辩证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观察事物,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不仅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的正面效用,而且也不忽视事物的消极影响;在想方设法发挥其正面效能的同时,善于消解负面影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此说来,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承认我国“经济的转型”、生产关系的某些改变,有着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只说“经济转型”之好,而无视“经济转型”的消极影响。只要一有人谈及“经济转型”的消极影响就似乎是“逆历史源流而动”。在一些人那里,对“经济转型”确实已到了讳疾忌医的程度。当然,我国“经济转型”的消极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导致劳动者地位的低下。

“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市场经济,下面我们就着重看一看市场经济模式的消极面为什么以及如何带来了劳动者地位的低下。

第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劳动者成为单纯的劳动工具。一部《资本论》就是对劳动者成为商品的控拆与揭露。劳动者一旦成为商品,劳动者就成为与其他“物”一样的东西。当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出去以后,自己实际上已沦为附属于人的工具,他的唯一属性就是像工具一样动作。劳动者沦为没有自主性的单纯的劳动工具,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在资本的拥有者眼里,他只不过是“租”来的一个劳动工具而已,劳动者这一生产手段在资本的拥有者那里与机器等其他生产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仅在于一个是“活”的生产手段,另一个是“死”的生产手段。现在一些人总把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售”自己视为劳动者享受自由的一种体现,对这种所谓“自由”的虚假性、危害性马克思当

年所作的批判言犹在耳,我们不能置若罔闻。正如一个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市场经济在把越来越多的人驱赶出传统劳动岗位的同时,让哪怕是留在劳动岗位上的最后一个人也在那里像工具一样高效地运作。

第二,市场经济推崇效率至上原则,进行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获取利润,使劳动过程成为纯粹谋取利润的过程,劳动者从属于GDP。市场经济是必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效率至上,还要市场经济何用?市场经济一旦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就直接地围绕着为资本的增殖这一轴心旋转。资本的逻辑就是增殖,不顾一切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借助于市场法则。生产的组织者完全服从于获取利润的目的,那就不会再考虑什么劳动者本身的自我实现。本来劳动者之所以从事劳动还有一个通过劳动来实现自身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加以顾及。另外,如果不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用“看得见的手”来加以干预,市场经济不可能与公平原则联系在一起,即使平时一些人所谈论的市场经济的所谓“公平因素”,那充其量也只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系“形式上的公平”而非“事实上的公平”。在市场经济统治下,劳动者渴望公平只是一种奢望,单纯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把公平的阳光洒到劳动者的头上的。试想一下,一个劳动者如果生活在只讲效率而无视公平的境遇中,还能感受到自己拥有与那些资本所有者同样的地位吗?

第三,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到激烈竞争的风口浪尖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主要是竞争的关系,劳动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笼罩下生活。市场经济是一种认可个人利益,肯定竞争的经济,这种竞争也表现在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上。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持自己的“饭碗”不惜与自己的伙伴展开竞争的争斗,不惜“以邻为壑”。我们平时总讲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不是文质彬彬的,可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可不是请客吃饭的,说的就是市场经济之下包括在劳动者之间竞争的无情。马克思在谈及劳动的异化时曾经把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也作为劳动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以论述,这是意味深长的。体面的劳动与富有尊严的劳动在一定意义上应当是一种劳动者相互合作的劳动。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人只有通过正常的交往,建立起相互信任、关注、依存的人际关系,才能实现自身。无疑崇尚竞争的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带来了功利主义的色彩,社会交往变成了社会交换,当然作为社会交换,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是有代价和期望得到报偿的。在市场原则支配下从事社会交往的人都是“孤独的人群”。不能设想处于幸福状态下的人们其人际关系竟然是漠不关心,甚至尔虞我诈的。

第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与依靠占有资本的人相比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即使不会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也会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推动市场经济正常动作的人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握有生产资料的人,他们依靠占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谋利,他们向市场投入他们的资本;二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他们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借助于市场经济谋生,他们向市场投入他们的劳动力。对市场经济来说,这两部分人都少不了,而且这两部分人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对方。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公正地对待这两部分人的,在一定意义上,在资本与劳动两者之间市场经济是一种偏袒资本的经济。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利益与资本的拥有者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中只分得一小杯羹,极大部分都流到了资本的拥有者的口袋。这是市场机制的一个自然过程。基尼系数在国际上通常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我们必须正视基尼系数在当今中国迅速上升的事实。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了2009年的0.47,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这一数字表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已“差距偏大”。另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活在基尼系数如此高、社会财富如此高度集中之下的我国的

广大劳动者,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我们认为,以上四个方面影响劳动者的地位的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敢不敢正视。著名的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曾经写过一本题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书,他在这一本书中详细而又旗帜鲜明地论证了计划经济是一条把人们引向奴役的道路。前一段时期,上海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另类”发起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我们是不是走上了另一条奴役之路?与会者大多认为,按照目前的市场经济模式搞下去,人类实际上走上了另一条奴役之路,而且受奴役的首先是广大劳动者。这一会议上所说的市场经济正把广大劳动者引上另一条奴役之路,实际上指的就是劳动者地位的不断下降。

在这里我们从生产关系的维度,具体地说,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角度探讨了当今劳动者地位的低下究竟是如何造成的,那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正因为我们把劳动者地位低下归结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那就意味着我们把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寄希望于废除市场经济模式,中止市场经济之路。这一结论不符合我们的本意。必须明确,我们这里所说的导致劳动者地位低下的因素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正如中国“经济转型”的其他方面一样,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尽管也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但显然前者远远大于后者。我们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存在这些负效应,不可能因为这些负面因素造成了劳动者地位的低下,而放弃整个市场经济模式。这就是我们不可能像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为了倒掉洗澡水,就端起澡盆连小孩子也倒掉了。人类的复杂性就在于其目标是多元的,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人类往往有着多种目标追求,不可能为了一个目标而放弃甚至牺牲其他目标。我们一方面不能因为实现增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目标而放弃提高劳动者地位的目标,同样我们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为了实现提高劳动者地位的目标而放弃快速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国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多种目标之间保持张力。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而是要强调,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因

素,缓和甚至消除这些负面因素对劳动者地位的影响是当务之急。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提出在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甚至提出“先富政策”,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无疑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相信,邓小平等市场经济的决策者在当时不会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会产生“两极分化”的问题。后来邓小平的许多讲话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当时的领导考虑的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基础上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认为还不是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时候,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但当时还不是重点解决“分化”问题的时候。如在当时就解决这些问题,就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实施,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所带来活力。而当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越来越鲜明地呈现于前,另一方面解决它们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是到了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的时候了。当年推出市场经济模式之时,一些人因跟不上形势死抱住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不放从而成了历史的“促退派”,同样在今天,正需要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之时,有人倘若不敢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不允许人们对市场经济说一个“不”字,那也将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如果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在影响着劳动者的地位这一点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余下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着手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我们认为,邓小平等市场经济的推进者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想像空间。他们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呢?他们为什么强调我们实施的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什么市场经济呢?在我看来,他们当时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他们当年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示意性的”,是“出于为了让他人更好地接受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社会主义这一别扭的限制词是早晚得去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着深沉的考虑的。他们实际上已经为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指明了方向,这就是:真正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

由此说来,我们提高劳动者地位的关键在于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而消解市场经济的关键又在于真正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比重,如何让市场经济只是发挥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如何让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市场经济,如何让作为真正的先进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人。当然这是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困难重重。但只要真正站在广大劳动者一边,真心实意为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而努力奋斗,只要真正沿着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加以结合的道路走下去,那么提高劳动者地位的目的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0-4-28(1).
- [2] 赵修义. 不要再回避生产关系了[N]. 社会科学报, 2010-6-31.

责任编辑:晓 凌